

Chinese Views on

中国视角

穿越西方现代

美学

吴炫◎主编

Western Modern

Aesthetics

西方存在美学

问题研究

张 弘◎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Chinese Views on

中国视角

穿越西方现代美学

吴炫◎主编

B83-069

4

2005

西方存在美学

问题研究

张 弘◎著

*Western Modern
Aesthetics*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存在美学问题研究/张弘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1

(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吴炫主编)

ISBN 7-207-06420-9

I.西... II.张... III.存在—美学—研究—西方
国家—现代 IV.B83-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9334 号

责任编辑:李文方 李珊
封面设计:中子画艺术设计

西方存在美学问题研究

Xifang Cunzai Meixue Wenti Yanjiu

著者:张弘

出版发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社址: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发行电话:(0451)82329930 (0451)82317541

电子邮箱:migrant33@yahoo.com.cn

网址:www.longpress.com

印刷:绥化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22.5

字数:312 000

版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7-207-06420-9/B·215

定价:2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作者简介

张弘，1945年2月生于浙江桐乡，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东北师范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曾在辽宁师范大学任教，德国柏林洪堡大学访问学者。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外国文学教研室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德语文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领域包括西方美学与艺术哲学、欧美文学史、中外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理论及文化批判。出版专著《美之魅——20世纪前的西方艺术和审美沉思》、《我心中的缪斯——西方文学经典的现代解读》、《临界的对垒——1989—1999学术文化论集》、《中国文学在英国》等六种，译著《阐释学与文学》、《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等四种，在核心期刊和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有关海德格尔与存在论美学及其他主题的学术论文80余篇。专著和论文分获教育部和上海市奖项及冯至德语文学研究奖。

内容简介

本书对以海德格尔（1889—1976）为代表的西方存在美学及其理论根据——存在论哲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它对中国现代美学建设的影响、启示及其本身的局限。内容分上、中、下三篇，首先依照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把握他存在之思的真蕴；其次从几方面领会他的艺术审美沉思，了解他在现代美学和艺术哲学视野上的拓展；最后回顾海德格尔的学说被结合到中国当代学术文化中来的各种形态，并探究从其无法逾越处起步走向更远前景的可能。

全书学理严谨，层次清晰，语言通畅，深入浅出，不少问题都提出了新见解，富于启发性，值得对海德格尔与存在论美学感兴趣的学者和广大读者参阅。

总 序

阐释、批判、创造的统一

近二十年来,国内哲学界、美学界和文艺理论界的学术状况,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的缘故,应该说总体上处在对西方现代哲学、美学介绍、移植、阐发的阶段,其内容涉及到西方现象学美学、存在美学、批判美学、阐释学美学、生命美学、解构主义美学、形式符号美学、人类学美学,等等。这些西方现代理论的引进,一方面使得中国美学界得以了解西方现代文论及其发展的基本状况,为中国文论将来能与西方平等对话铺设了台阶;另一方面则突破了实践论美学、认识论美学和社会—历史学批评模式在近五十年内的单一化局面,不仅为中国美学与文艺理论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而且初步形成了当代文论的多元杂陈的格局。我把这种格局的建立,视为中国思想理论界开始有正常的生命状态的一种显现。尽管理论的生命状态还不等于我所说的理论的存在状态(即能以中国当代自己的创造性理论和西方构成平等对话的状态),但却是后者赖以实现自身的前提。

目前国内关于西方现代美学研究的状况,据我所熟悉的情况来看,像哲学界的倪梁康教授之于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研究,陈嘉映教授之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翻译和研究,海外成中英教授之于西方阐释学本体论研究等,都是专门研究西方某一种哲学且有造诣的学

者。而像早期高尔泰、孙津教授等之于西方自由美学研究和阐发,杨春时教授之于西方的超越美学的研究,潘知常教授之于西方生命美学的研究,赵宪章教授之于西方形式美学的研究,等等,虽然学术影响程度不一,但多少可以说明在实践论哲学、美学占主导地位动摇之后、美学界引进和阐释西方现代美学的状况。尽管不少学者在对同一种西方美学的理解上各有差异,但以对西方理论的基本认同为研究模式,则是比较相似的。这一点,更突出地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上出现的“回到马克思”的研究现象上。在美学史研究上也多半如此。蒋孔阳、朱立元教授主编的七卷本《西方美学通史》,一定程度上是在为我国对西方古代、近代、现代美学的阐释性研究做总结,周宪教授的《20世纪西方现代美学》,也是对西方现代美学阐释的专题集成之作。与此同时,由西方法兰克福批判美学奠定基础的文化批评,不仅成为所谓中国“新左派”认同的理论资源和学术界一些愤世嫉俗者的认同对象,而且在当代,已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不断放弃文学研究,投入到外延与内涵均不断扩大的文化研究队伍之中,其势方兴未艾。虽然在对西方理论研究的方面,已有学者开始注意到中西方理论打通并有建设意识地投入——如以西方阐释学触发的汤一介先生的中国阐释学研究,正在做与中国阐释学传统打通的工作,以西方原型美学为基础的文化人类学研究,在叶舒宪等教授的实践下,已经作为国内文艺理论界的一种有创造性努力的现象而存在。上述各类研究虽然可分为宏观研究、微观研究、史的总结和专题研究,但究其总体研究特性而言,我以为基本上是一种梳理和阐发性研究,是向我们介绍西方文论或以西方文论来解释中国文化、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研究,或者是在对西方理论基本认同的状态下作“微调”的研究。

作为一种学术上的正本清源之努力和初步接触西方理论的中国研究状况,我对上述研究方法当然是理解和尊重的,就像我肯定生命状态本身就是以模仿、依附、繁衍为其基本性质一样。但我觉得,随

着理论建设和美学建设的“中国化”和“当代化”要求的提出——特别是如果我们不把“当代化”理解为“西方化”的话,上述以阐释西方理论为宗旨的研究模式,已逐渐暴露出与中国文化特性和当前文化的创造性建设所要解决的问题脱节的情况,并进一步暴露出我们在学理上对“什么是理论研究的本体”思考上可能存在的误区。这大致表现在:

1. 在阐释西方理论与创造中国自己的理论之间,我们还缺乏中介性的“批判”环节和对西方基本原理的“问题意识”。现有的西方现代美学研究,在以中国文化特性为立足点,尤其是以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为出发点,对西方各种现代美学进行反思和批判方面明显不够,这就使得在西方文化语境下产生的各种理论,在“为我所用”方面,还缺少根本性的、基本原理与范畴的改造工作。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对西方现代文论认同多于审视,积累多于创造,并误以为“积累必然导致创造”或“积累之后再创造”是天经地义的。但中西方思想史的经验是:很多博学的专家并无自己的思想创造,而中西方的一些思想大家是否是以“博学”为基础并有学术性思想史著作的专家,答案多半也是否定性的。所以我在这个方面的看法是:思想史做得再好,也不一定能产生自己的思想,因为这是两种工作范式——前者是总体认同的解释性研究,后者是总体批判的创造性研究——批判性研究是将前人的任何一种思想和理论放在当代问题下来暴露其理论的“局限”,而且是暴露其基本原理的局限,而不是以“弄懂”、“弄通”前人的各种思想为目的。如果人类历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不断解释的历史,那么就不存在“终极阐释”和自以为不会改变的“弄通”、“弄懂”之问题。这种状况既可以说明个体化阐释的发展,也可以说明整体的、时代的阐释之演变。另一方面,中国当代美学在基本理论命题和逻辑起点上,多是西方概念和西方式的思维方式,中国特性不明显,基本上是在沿用“实践”、“生命”、“形式”、“超越”这些现成的概念或范畴;或满足于只是在局部和技术上做一些改变,导致一些似是

而非的概念的提出,如“审美的、历史的、社会的统一”,其理论如何操作,可以解决中国的什么问题,像“融汇”之笼统一样,既不得而知又语焉不详。经验和感觉的成分明显大于理论思维所要求的内在逻辑清晰和问题追问。于是,这样的美学理论研究,不仅在现实中不同程度地失去了对中国当代大众的审美亲和力与引导力,基本上成为一种以现代性面目出现的经院式研究,而且在学理上,也基本上是西方思想的奴隶而不自惭,谈不上对纯粹学理的推进与发展,更谈不上向世界贡献中国学者自己的当代理论话语。

2. 理论所要求的“批判与创造的统一”,是与时代发展所要求的“改变”和“选择”有重要区别的。这是因为:思想界和理论界曾经流行的“反思”概念,多是以西方学人的反思来反思,缺乏对西方式反思的中国自己的反思,如“反理性”、“超越文学性”、“告别现代性和总体性”等文化批评热就是一例。究其原因,我以为主要来自这样一种认识上的偏差:理论的批判不是用现成的理论与另一种现成理论构成所谓“批判关系”,而必须是以自己的理论逻辑起点和理论范畴与现有的理论构成批判关系。这样的一种批判我称之为“本体性否定”。由于中国理论界是在既定的理论知识上进行“选择性批判”,这就不可能使批判结果导致基本原理和范畴的创造,并形成了理论反思的“生存性”代替“存在性”之弊端。这样的状况既来自中国以“博学”为治学最高境界的学术传统,也来自当代学者“知难而退”的学术人格的孱弱。如果说,围绕“理论研究”是否要有逻辑的严密、体系的完整、思想的无根本冲突来讨论问题,还是比较表面化的讨论,更为根本的,我以为是 中国学者对理论和知识“生产冲动”的遗忘与不自觉,遗忘了理论是来自于自己所发现的现实问题(理论视野中的“问题”只能是自己发现的问题而不是别人提出的问题)与所有既定理论的批判性关系这一常识。这种遗忘,是中国理论界满足于认同性而不是批判性地阐释西方理论的原因,并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自己特定的问题区别西方的“劳动异化”和“理性异化”,中国的后现

代主义理论也没有自己特定的问题区别西方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各家理论。

3. 如何理解“中国性”,又如何理解“中国当代性”,是问题的关键。我的看法是,如果仅提“中国性”而不提“中国当代性”,于解决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无补。因为仅提“中国性”,大多数学者很快会习惯性地以中国传统文化特性为依托,或者退而求其次地将所有的汉语表达都理解为“有中国性”,类似于只要是用中国话说话便有“中国性”。由于前者会导致以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和范畴为依托,或者感觉性地、但却不具备理论操作性地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与西方文论范畴进行愿望性的“融会”——“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这种提法,现在就进入了这样尴尬的、只能呼唤的状态。所以这条思路必然不会诉诸中国当代文化和理论范畴的原创性努力,也很可能会维护20世纪中国文论杂乱的、在中西方各种思潮之间忙乱的状态,中国理论工作者的经验化形象便成为宿命。要改变这样的状况,就必须以“当代性”作为“中国性”的限定。但“当代性”并不是西方性,而是也应该对西方基本理论进行批判的“原创性努力”。所以“中国当代性”就是原创性的审美悬置。这正是我建立“否定主义理论”并于10年前与一些同道提出“第三种批判”的初衷。这十余年,我个人从没有放弃这样的努力,自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这样的努力。对后者,我就不想多说什么。因为如果用汉语说话就有“中国性”,“中国性”就会被定位为中国学者的经验和感觉。而由于中国人的经验和感觉永远不会消失,这就不仅取消了“中国性”作为一个问题存在的意义,而且会助长中国学者思想的堕性和在基本原理方面的依赖性,20世纪中国文论,也就不存在什么思想贫困之问题。

4. 如何将对西方现代美学的研究与创造中国式的当代性美学建设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存在一个延续中国文化的精神与具体改造中国传统文论范畴并行不悖的难题,也存在着一个汲取西方理论材料和剥离西方理论的文化特性并行不悖的问题。前者是“宏观继承,

微观改造”的问题,后者是“宏观剥离,微观汲取”的问题,这里需要新的方法论建设。一些试图打通中西方理论的学者,我愿意从积极的方面去设想一种既有所区别于传统、也有所区别于西方的理论,是这样的学者的审美向往。但由于在西方现代文论和中国传统文论的打通方面,目前还存在着简单比附、演绎、进而立场不明的情况——或从中西方理论形态的相似性导致回归中国传统文论之倾向,或以中国文论来验证西方理论的合理性,而忽略中国当代美学建设对中国传统文论也存在着超越性的问题。这就使得我们发现西方现代美学的局限,不能简单地以中国传统美学的特征为尺度,而应该以中国当代文论的原创性期待为尺度。我所提出的“本体性否定”理论及其思想和文化批判实践,正在于建立这样的方法论。“本体性否定”主张穿越传统“不西即中”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和“中西融会”的经验化模式,将中国当代文论的原创性期待作为外化于既定二元论的第三种立场来对待,从而建立一种对中西方美学进行“双重局限研究”的思维模式。比如,在对待中国“天人合一”和西方“天人对立”两种思维方式上,“本体性否定”不取“既要天人对立又要天人合一”的调和思维,也不赞同将“天人对立”与“天人合一”看作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以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为坐标,既看到“天人对立”的不平衡性,也看到“天人合一”的非创造性,从而通过改变“天”与“人”之间的相克性否定关系,建立新的“天”与“人”的对等关系。我所说的“天人分立”,是“人尊重天又不至于天”的“穿越思维”,自然可以有其他学者提出其他关系命题,甚至消解这个命题。这就在理论的基本思维方式上既有所区别西方、也有所区别中国传统。基于上述这些初步的想法,便形成了本丛书试图将“阐释——批判——创造”一体化的研究思路,在体例上就形成如下三块研究格局:一是概括或描述西方理论的基本内涵,这体现为对阐释西方理论研究的尊重;二是分析国内研究西方理论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这包括作者对国内西方理论研究的看法;三是阐发研究者对西方理论局限的认识以及弥补这一局

限的个体化理论设计。

这使得本丛书的研究方法不是“拒绝阐释”而是“穿越阐释”(即不限于阐释),从而体现本丛书对西方现代美学理论与前期学术积累的尊重;也使得本课题的研究方法不是“独抒己见”和“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在占有充分材料基础上的问题梳理与分析。应该说,参与本丛书写作的学者,是在尊重国内学者已经取得的西方现代美学研究的成果基础上,对国内的西方美学研究的得与失,进行了研究者力所能及的评价。其“得”,既包含研究者对西方美学比较深入的阐释和理解,也包含尊重国内现有西方现代美学研究在阐释、介绍西方理论方面所做的宏观与微观的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更包含对现有西方现代美学研究水平的一个整体定位。其“失”,包含国内学者出于各种原因对西方文论所产生的误读与曲解,以及对此的纠偏。当然,所谓纠偏,永远可能只是互为的。参与本丛书的学者并不具有“没有问题的纠偏”这样的优先权。但有这样一个环节,至少可以揭示研究者的研究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对西方理论的理解上。事实上,我以为不同的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并不会在根本上影响研究者自己的理论的产生。比如我们不能说海德格尔对西方所有以“存在”为标志的哲学的理解,就是正确的,但海德格尔可以通过这样的理解,建立自己的存在哲学。在理解问题上,其实并无“正确”与“错误”之分,也不可能有一个“最准确的理解”放在那里,等待我们去努力。这不仅因为“最正确”、“最准确”的理解如果产生,理解的历史便有可能终止,而且因为,理解的有意义性,永远只能是“当代的”或者“自己的”同义语。即便以“实证”作为“科学性”的标准,也只能在自己占有的材料的范围内才是“有科学性”的,但材料的不断发现或新的解释,还是会使原来的“科学性”只具有相对意义。由于本课题的目的主要不是在于阐释和准确把握西方现代美学,这就保持了对现有西方现代美学研究进行客观评价所必须的审视距离,在理论与实践上显现出“西方现代美学研究之研究”的努力的意义。

自然,由于“中国性”和“当代性”的双重视角,给本丛书的研究提出了较高的理论和实践的要求。事实上,我不能说丛书的写作已经达到了这样的要求,甚至我想说离这一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但之所以又让这套书面世,是因为我17年前提出“本体性否定”时,很多想法还不够成熟,故中国学者建立自己的理论,只能作为一个过程来看——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学者一出场,便有自己的理论命题的产生,而且能自立其说,或者以什么不够严谨来苛求之。在治学上,我宁愿选择不够严谨但确实有创造性的学者,而不选择严谨规范有余但却总体平庸的学者。所以,我不能说参与丛书写作的学者,将来就能建立自己的理论,因为他们愿意参与这样的工作,并尽可能朝丛书的宗旨方面去努力,不管努力的成效如何,这都是值得自己和学界来纪念的。我前面说过,中国学者除了会依托现成的理论对另一种理论进行所谓“批判”,在批判问题上还远没有成熟,这种不够成熟,自然也会不同程度地反映在本丛书的作者们身上。从物色丛书作者的困难之开始,到有的作者中途因为各种原因放弃,再到有的作者几易其稿还是不够满意,均能说明这个问题。而且客观地说,我也不能说已经放在读者面前的这些著作,就没有遗憾了。比如张弘教授的《西方存在美学问题研究》,在对海德格尔美学的深入理解上,应该说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使得我们读起来比较清晰和流畅,但在对存在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命题的反思与批判上,还没有来得及展开,所以他的书名为“问题研究”。王晓华教授的《西方生命美学局限研究》,最后虽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一些命题和想法,但还没有能建立自己比较清晰的逻辑起点与理论范畴,来概括自己的思路。汤拥华是我以前的博士研究生,他的《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是其博士论文,虽然在反思西方现象学美学的来龙去脉上得到文艺理论专家们的肯定,但正面的自己的立论还不可能展开,一些观点也会有可商榷之处……我想,以后丛书中陆续出版的书,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样的状况,我想正体现了批判性研究在初期的正常状况:或因为阐

释性研究的惯性还很难有明显的转折,或有了自己的想法但还不能一下子成型,或目前只能提出问题而还不能一下子以自己的创建解决问题。我想,只要这些作者再努力10年到20年而不放弃,他们的理论创新工作,可能会更令读者和学界满意。如果这套陆续能够正常出版的丛书,能够在理论批判与创新上有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促发其他学者在相关课题上产生更出色的批判性研究成果,那我会更加高兴。因为中国当代美学建设,要靠大家的共同努力。但一个做我所说的努力的学者,绝不能因为没有群体性努力的气氛而放弃自己的努力。

最后,对本丛书可能涉及到的理论,我简述一下我的基本的“局限性理解”:比如从中国文化注重现实性出发,西方形式美学存在着“抽象性”和“纯粹性”问题;这使得西方建立在“纯粹形式”基础上的“艺术本体论”思维,不适合解释中国以现实性和写实性为特征的文学经典。因此西方形式主义文论应该做“中国现实化的形式”之改造,这种改造可以见仁见智。而从中国文化的和谐性出发,西方批判美学存在过于强调“对抗性”和“非理性”之问题。而中国当代文化的发展目前主要是建立新的当代理性;我们所需要的是“不同而并立”的平衡性否定观和以这种观念建立起来的“理性”。从中国文化注重具体性和操作性特点出发,西方存在美学存有“自由”、“可能”的空洞性与诗性存在的“难以把握性”之问题。这使得“存在”在中国应该进行理性化的思考与建设,甚至提出不同于“道”也不同于“存在”的新的哲学范畴;在这之前,至少应该对“道”与“存在”进行个体化的创造性理解。从当前文化创造的要求出发,西方阐释学存在着“如何进行创造性阐释”以及方法论建设之盲点,这也是中国阐释学亟待解决的课题。从中国文化注重生存性出发,西方生命美学存在着忽略生态生命和身体生命的问题,而对超越生存与身体的人文精神,也应该做区别于西方宗教文化的解释等等。自然,对这些美学的局限,参与本丛书工作的学者均有自己的理解,我尊重他们的理解,并期望他们将

自己的理解的萌芽,能逐渐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从而形成我所渴望的“不同而并立”的思想和理论格局。这样的格局,我才称之为“理论之正常”。

吴 炫

2004 年 10 月 31 日于日本神戸大学

鹤甲寓所

引 言

西方存在美学是和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1889—1976)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海德格尔在知识昌明、科学繁荣的 20 世纪,重提西方哲学史上悠久而古老的存在问题,对传统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发起了挑战,终其一生,追问着那个玄妙莫测,几近虚无的“存在”,继而迈进了艺术、诗和语言的王国,让不同于一般逻辑思维的思延伸到审美领域,从此形成了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为理论依据的存在美学。

分析存在美学的问题,思考在中国语境里如何借鉴、把握和克服这些问题,不能不从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开始。但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素以艰深繁难著称,他的著述难以卒读,每每令人望而生畏。通常的做法,是以条理化、体系化的方法,把它分解为几个块或点,使它变得比较简易和方便掌握;也有的索性发挥其玄虚一面,微言大义而见首不见尾,给人一种加倍高深莫测的印象;要不就兼而有之,一边介绍内容概况,一边感慨其奇特而难以理解,似乎在反映海德格尔思想的本来面貌,但其实在为自身诠释的不足留下退路。不用说,这些做法,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正如有的国外学者指出的,应当放弃只限于转述海德格尔的思想结论,或把它放置在逻辑体系的平台上另行拼合的做法,而根据海德格尔本人的思想之路探讨他哲学的真蕴。我们赞同这样的观点,首先因为符合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实情。他经常称自己的“思”是“在路上”,而且还不是笔直的通衢大道,相反是踪迹出没无常的“林中路”。因此我们对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探索,关注点放在对他思想发展轨迹的追踪上,以期达到一种更迫近理

解。关于这条思想道路,历来有前、后期和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提出的前、中、后三期的不同区分法。我们在同意海德格尔的思想经历过转折的前提下,未作具体划界,一方面为了叙述方便,另一方面也是尊重海德格尔本人意见——他从来认为自己的思想历程是一以贯之的。

海德格尔有关艺术审美的沉思是存在美学的基本规定和基本内容。相关的几个重点,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它们需要从总体上领会,而不是只看其中的片言只语。海德格尔关于艺术本源的探讨、关于美与真的同一性的重新奠基、关于诗的神圣地位的返魅、关于语言与物性和存在之内在关系的揭示,包括同尼采在艺术与生命力问题上的争议,组成了存在美学的核心部分。在构成存在之思更深邃的有机组成的同时,也为现代美学和艺术哲学拓展了全新的视野和维度。不进入这一全新视野和维度,仅仅从远处匆匆一瞥,是无法懂得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或诗学的,所得唯有皮相,甚或事与愿违。需要返回到原始的与神性共在的体验中去,穿透艺术作品手工制作的坚固外壳,领悟和回味本真绽亮的刹那喜悦,冒险进入现象形式背后不可知或不可见的黑暗深渊。在这里,仅有知识和理解的能力是绝对不够的,还要有直观和想象的辅助,更要求有超越世俗之见和物质尘障的绝顶目力,才可能共享海德格尔对美的奥妙的独特洞察。

我们是在华夏本土的中国语境里接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和存在美学的。渐成规模的翻译、介绍、评述、阐释和研讨等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开始,至今已近二十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和存在美学,已通过各种途径,被结合到中国当代的学术文化和理论建设的进程中来,成为一个不容抹煞的思想元素。所有这一切,说到底,都是我们同海德格尔之间一种超越时空性质的对话。它必然反映出中、德民族和东西方彼此文化、语言、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和类似。除了这种族群层面的大分野,与此同时也折射出每个参与对话者的具体思想个性。正是这一点,使得存在本真在华夏大地的绽亮,呈现出缤纷斑斓的多样场景。就像在林中路间逡巡的人,来到者和离去者都不是个别的,都有自己的姿态与路径。有的人宣布,他们已经跨过

了或告别了这片思之敞亮地；有的人还在守候，还在其中苦苦踟蹰、寻索或留连忘返；有的人刚刚踏脚进来，在边沿地区张望。他们寻获了先行者的足迹，并沿此走上了正确的方向吗？还是迷失在踏勘的标志中，废然而叹，焦灼不安？甚至干脆找一条捷径，匆匆走过完事？……这种种情况，当我们今天再度领会海德格尔思之道路时，都值得回顾和反思。当然，我们的最终目的，仍在通过思想的寻踪和学理的涵泳，沿着他开启的方向，从他无法逾越的地方，探索起步走得更远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主张，思之把握应直攫并突出那些“真正的问题域”。我们对存在美学的问题研究也如此，它乃是语境、历史和学理三位合一的分析。一个方面，需要考察中国本土有哪些话语因素导引和影响着对西方存在美学的理解和接受，在一定的上下文里又产生了何种有关存在美学及其理论基础存在论哲学的言说。另一方面，这样的理解和接受又在历时中展开，虽时间尚属短暂，却有不容抹煞的前后轨迹，值得加以追索。而最核心的，则是学理的分析，因为理解、接受和言说展开过程之中的种种差异及变型，只能通过学理的比较方能明了并足以保证，最终存在美学在中国的继续生存和成长，也奠基于是学理的可靠与坚实。